

《瓦解》中的历史重写与族群伦理

Rewriting History and Ethnic Ethics in *Things Fall Apart*

何卫华 (He Weihua)

内容摘要：《瓦解》以史诗般的笔触绘就了一幅幅充满乡愁的关于非洲风土人情的画卷，在作品呈现的以传统伦理秩序为核心的乡村共同体中，不仅有完善的宗教、行政和司法体系，还有共同体成员间的温情和相互守望。然而，随着白人的到来，在宗教和暴力的双重进逼下，传统的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开始土崩瓦解。阿契贝并未将这一悲剧性命运一味地归咎于外来力量的侵蚀，而是同时对非洲社会的内部缺陷进行了反思，这使得《瓦解》绘就的历史图景更鲜活、完整和充满张力，他关于非洲历史、文化和命运等问题的伦理考量由此得以彰显。在本文看来，这一双向伦理思考得益于阿契贝的双重伦理身份，但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性修辞的影响，在族群伦理关系另一种可能性这一关键问题上，阿契贝陷入了伦理困境。

关键词：《瓦解》；乡愁；共同体；族群伦理；伦理困境

作者简介：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比较文学和族裔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和现代转型研究”【项目批号：18BWW01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Rewriting History and Ethnic Ethics in *Things Fall Apart*

Abstract: *Things Fall Apart* presents us a fascinating picture about the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in Africa. In the agrarian community depicted in the novel, we can not only find well-organized religious, 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structures which abide by the traditional ethic order, but also harmony between the local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encroaching effect of Christianity backed by violence,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its ethic order disintegrated. While ascribing the breaking-up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the invasion of the white people, Achebe did not forget to reflect on the inherent problems in the African society. His ethical concerns about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fate of Africa undoubtedly contributed to the breadth, density and tension of the story. This paper holds that Achebe is endowed with double ethical visions because of his double identities. However, he encounters an ethical dilemma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 ethnic ethic relationships after falling victim to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modernity.

Key words: *Things Fall Apart*; nostalgia; community; ethnic ethics; ethical dilemma

Author: He Weihua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also the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thnic literature (E-mail: whua_he@163.com).

一切都在土崩瓦解，中心已无法维持，
混乱开始弥散于这个世界。

—— W. B. 叶芝 《基督重临》

非洲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民吃苦耐劳，但从 15 世纪起，欧洲殖民者纷至沓来，开始大规模地侵占非洲的土地，掠夺非洲的资源财富，屠戮和贩卖非洲的人民。长期的混乱、纷争和来自西方的全方位压制，不仅使非洲至今仍为地球上最贫穷的大陆，同样极大地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非洲国家纷纷宣布独立，然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发现自己的历史竟然一直由欧洲殖民者书写。在这一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运动在非洲大陆风起云涌，涌现出一大批星光四射的非洲作家。在这些令世人瞩目的非洲作家中，阿契贝作品的想象力、丰富性和思想深度都可谓是无可比拟。在世界文学版图上，阿契贝已成为非洲文化的重要符码，正如基拉姆（G. D. Killam）所言，“钦努阿·阿契贝不仅是尼日利亚最为知名的小说家，同时在来自整个黑非洲的小说家之中，他的名气可能也是最大的”（1）。西蒙·吉坎迪（Simon Gikandi）则说到，“不管是就读者的数量而言，还是就在学术界得到的关注而言，没有任何其他的非洲小说家可以和阿契贝比肩”（1）。伯恩斯·林德福（Bernth Lindfors）的评论最为简洁明了，他指出，“钦努阿·阿契贝是非洲最为重要的小说家”（ix）。值得注意的是，阿契贝一生只创作过五部长篇小说，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帮助他一路攀高摘桂，赢得了世界性的文学盛誉，就连沃莱·索因卡、戈迪默和库切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不断向他致以敬意。经过岁月的冲刷、挑拣和磨砺，阿契贝的作品现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广为流传。但总的看来，在众多批评家眼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瓦解》无疑是其扛鼎之作，这是“一部最广为人知的由非洲黑人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Wren 8）。关于《瓦解》的重要性，吉坎迪指出说，对于很多研究非洲文化的学生和学者而言，《瓦解》的出版标志着现代非洲文学的开端”（1）。

在《瓦解》中，通过充满乡愁的笔触，阿契贝不仅为读者描画了一幅幅

鲜活、完整和充满生机的社会图景，生动地呈现了其内部的诸种伦理关系、规范和秩序的维系、变革和重构，还对这一共同体内部的迷信、愚昧和缺陷进行了反思，这部作品也由此变得立体、厚重和充满魅力。聂珍钊指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7）。在论述“修复型乡愁”（restorative nostalgia）和“反思型乡愁”（reflective nostalgia）时，博伊姆（Svetlana Boym）指出，“就修复型乡愁而言，过去对现在意味着一种价值；过去并非是一种延续，而是一张毫无瑕疵的快照。而且，过去不应该展现出任何衰颓之气；而应是按照‘初始的形象’刚刚绘就的画卷，青春的气息将永驻。反思型乡愁则更为注重历史的与个体的时间、过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反思意味着新的可塑性，而并非停滞状态的重建。这里的焦点不在于再现感知到的绝对真理，而在于对历史和时间流逝的深思”（49）。在本文看来，在《瓦解》中，博伊姆意义上的“修复”和“反思”这两个维度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各自的伦理指向不尽相同：“修复”更多是在表明作者对已“瓦解”的非洲传统伦理秩序的怀念，通过记录传统非洲社会和伦理秩序在帝国的冲击下分崩离析的进程，对帝国进行控诉；而“反思”传达的则是作者关于全球历史进程中的族群伦理关系的思考，在批判殖民力量时，同时检讨了非洲民族性中的缺陷。在帮助读者充分感受到阿契贝伦理关怀的丰富性、立体性和辩证性的同时，这种辩证的、省思的和全面的态度同样使得阿契贝成为当之无愧的“非洲现代文学之父”。

一、“狩猎者的颂歌”与阿契贝的伦理身份

特殊的人生际遇决定了阿契贝伦理身份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导致了其伦理选择中的张力、摇移和内在冲突。作为尼日利亚人，阿契贝对非洲文化有着自然而然的亲近和认同，但由于其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式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对比和冲撞构成了其成长的伦理环境。双重的滋养塑造了阿契贝的世界性眼光和超然的清醒，阿契贝由此能够跳脱单一族群的局限性，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来考察族群伦理关系，去思考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和平共处和共同进步等重大问题。同样正是由于其双重的、超越的和反思的视角，在重写非洲历史的过程中，在反对、批评和控诉殖民主义的同时，阿契贝还能从世界文明进程出发，站在族群伦理关系的高度，去检视内在于非洲社会的各种问题、弊端和伦理失范。

阿契贝是尼日利亚伊博族人，尼日利亚位于西非东南部，这块蕴藏着丰饶资源的黑土地是“非洲的巨人”，曾被视为“希望和进步的灯塔”（Falola 158）。然而，在 15 世纪，尼日利亚就遭到葡萄牙人的入侵，在 20 世纪初则又沦为英属殖民地，虽然其国土面积远远超过英国，大量的黄金、纺织品和

各种农作物开始源源不断地为帝国输血。这里的人民饱受煎熬，创巨痛深，但在二战期间，他们仍积极响应号召，不惧流血牺牲，应招入伍，同英军并肩战斗，前仆后继。二战无疑是尼日尼亚独立运动的催化剂，在为反对专政、种族主义和各种非正义浴血奋战的同时，这些战士开始检视和反思自己同英国之间的关系，在回到故土家园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开始为争取民族的自由、尊严和利益而斗争。¹ 在本文看来，这同样还应归功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掀起的反殖民和民族独立浪潮。在这一时期，一大批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本土知识分子不断致力于推翻殖民统治，希望建立由非洲自己人领导的新政府。在 1944 年，伊博族人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出任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议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Nigeria and the Cameroons）秘书长，这意味着尼日利亚建设独立政府的事业开始进入全新阶段。² 经过不懈的努力，在 1960 年，尼日利亚获得独立，开始以全新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国家亟需一次文化上的革命，应挖掘本土资源，以便重新想象和建构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新的民族身份认同。爱德华·萨伊德曾强调，对前殖民地国家而言，在经过武装斗争获得独立后，迫在眉睫的就是次位抵抗（secondary resistance），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抵抗，这需要恢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宗主权、重新想象共同体、重构和勘定民族的文化地形图。³ 作为对这一伦理诉求的实践，尼日利亚知识分子开始不断质疑过往帝国对殖民地的文化表征，致力于恢复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重塑民族主体性。在这一文化重构的伟大征程中，阿契贝劳苦功高，正是由于他的卓越功勋，在现代非洲文学殿堂中，阿契贝当之无愧地稳坐头把交椅。

年幼时，时势动荡不安，但值得庆幸的是，阿契贝自幼就受到很好的教育。阿契贝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的父亲小时候是孤儿，由舅舅抚养长大，在皈依基督教之后成为了传教士。因此，虽然是道地的非洲人，但阿契贝从小就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出门在外，惯见熟闻的是父老乡亲们依然信奉的传统宗教；在家里，耳濡目染的却是漂洋过海而来的基督教。待年龄稍长，他开始在教会学校上学，修习的课程大多是用英文讲授。阿契贝聪颖好学，之后获得一笔奖学金，进入隶属于伦敦大学的伊巴丹学院学习医学，同在这所大学有过求学经历的还有后来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但入学后不久，生性敏感的阿契贝发现文学才是自己的兴趣之所在，于是放弃来之不易的奖学金，转而攻读文学。在大学，文学专业的课程开设和英国本土的大学大致一样，因此阿契贝有机会接触到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

1 参见 C. L. Innes, *Chinua Acheb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8-9.

2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8) 136-154.

3 参见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3) 209.

斯、托尔斯泰、狄更斯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并对这一“伟大的传统”极为熟稔。此外，他还接触到康拉德和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等人的作品，这些白人作家不断将黑非洲纳入帝国的文学版图并为之代言。¹ 在这些作家关于非洲的文学叙写中，非洲的“劣等性”被从各个角度来加以论证，黑人被视为劣等的、野蛮的和无知的，欧洲人被和理性、光明和进步等同起来，高下立判的二元对立使殖民统治显得合情合理。

文学作品中隐含的种族主义一直是阿契贝口诛笔伐的对象，在他看来，此类作品无异于“狩猎者的颂歌”，因为“在狮子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之前，关于狩猎的故事只可能是狩猎者的颂歌”（Achebe, *Home and Exile* 81）。阿契贝多次谈及乔伊斯·卡里的作品《约翰逊先生》（*Mister Johnson*）对他的影响，在作品中，主人公约翰逊是位尼日利亚的小职员，行为不太检点。在帮助年轻的英国殖民地官员鲁德贝克修路以及为白人工作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经常玩弄各种手段。后来还因偷窃被抓现行，在打斗中失手杀死了白人店主，最后被处决。温文尔雅的鲁德贝克被非洲土著约翰逊视为父亲般的人物，二人间的区别判若云泥，前者理性、克制和充满人文关怀，后者冲动、放纵和非理性。以隐喻的方式，这部作品再现了殖民者眼中的非洲和欧洲之间的相互关系，非洲的激情、任性和非理性需要欧洲的启蒙、引导和教诲。1974年，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讲演时，阿契贝还曾以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为例，抽丝剥茧地剖析了其中蕴藏的种族主义思想。在阿契贝看来，非洲被康拉德描述为文明的对立面，究其根由，是“由于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需求，即把非洲看成是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得以显影”（穆尔-吉尔伯特 182）。非洲人被污名化，白人则被神圣化，对白人不敬，就像是“揭开祖先灵魂的面具”那样十恶不赦（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69）。英语文学传统中的种族偏见让阿契贝如鲠在喉，经常被其刺痛。在任何时代，作家都是伦理责任的重要承担者，站在非洲本土的立场，阿契贝开始警醒于欧洲人对非我族类的偏见。不平则鸣，蚌病成珠，在阅读《约翰逊先生》之类作品时累积的愤懑，促使阿契贝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重新想象和讲述非洲，从而创作了《瓦解》和《再也不得安宁》²，并将自己的伦理诉求寄托于其中。

文学创作成为了阿契贝的一种伦理选择。文学创作应直面现实社会问题，应为变革社会、政治和文化助力，“任何真正的有创造性的非洲作家，要是试图回避当代的非洲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后结果必将是流于空泛——就像那个谚语中的人一样地荒诞不经，在房子着火时不是去救火，而是去追赶那只从烈焰中逃出的耗子”（Emenyonu xx）。在获得来之不易的独立后，尼日

1 参见 C. L. Innes, *Chinua Acheb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1-20; Thomas Jay Lynn, *Chinua Achebe and the Politics of Narra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1-18.

2 参见 C. L. Innes, *Chinua Acheb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21.

尼亚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作为塑造、表达和弘扬民族意识的重要力量，文学的重要意义在此时不言而喻，因为“对我们而言，文学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关乎生死的事情，因为我们正在塑造一种新人”（Lindfors 75）。作家应肩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在国际上发出非洲的声音，阿契贝对这一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当阿契贝选择不再“站在白人一边，反对野蛮人”（阿契贝，《非洲的污名》133），而去追思“美好的”往昔，重新想象前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历史，其文学空间中弥散的乡愁也就成为一种具有伦理意义的情感。在《瓦解》描绘的共同体中，大家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甚至不适宜的对他人的轻蔑都会遭到长老们斥责（25），当读者在这一幅关于过去的美丽图景中流连时，帝国关于非洲的种种谎言自然就不攻自破。当然，乡愁的伦理意义是多重的，并非仅仅停留于“对消逝的时光的一种模糊的、集体的向往”（Fritzsche 1591），约翰·苏（John J. Su）就指出，乡愁不仅可以被用来传达“对当下的不满（……）只有通过失却的或子虚乌有的共同体的乡愁式的召唤，他们的文学文本中更具乌托邦性质的关于共同体的想象才能成为可能”（9）。就《瓦解》而言，在传达对过去的人物、情感和价值的珍视的同时，作为一种伦理情感，乡愁还传递着阿契贝关于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重诉求，其终极指向不仅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控诉，同样还包括作者关于非洲民族性、族群伦理关系和非洲未来的思考。

二、共同体的破碎与伦理秩序重构

在虚伪的帝国叙事中，征服和占有非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掠夺资源，不是为了横征暴敛，而是“启蒙”，是“辛辛苦苦地把文明带到非洲的各个地区”（185）¹，是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意义上的“白人的负担”。按照帝国的逻辑，黑人被认为是低劣的、缺乏道德感的和有待救赎的，而非洲则被认为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阿契贝因此强调说，“在我试图传达的众多消息之中，一个重大的消息就是在欧洲到来之前，非洲并非真空，非洲并不是没有文化，文化并不是由白人世界带到非洲的”（Lindfors 29）。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种伦理情感的乡愁，首要目标就是去“抚慰历史的疮疤”（Fritzsche 1592），对质帝国的谎言，重构前殖民地时期的非洲文化。就此而言，《瓦解》是对帝国谎言的回应，“是抗议，因为有人认为我们没有过去。我们当时的所作所为正是要去礼貌地指出这并非事实——这里的就是”（Lindfors 29）。在阿契贝笔下，“非洲人不是怪异的生物，名字不易拼读，想法不可理喻”（阿契贝，《非洲的污名》141），他们不仅都有着各自的梦想、激情、习俗、信仰，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还更能感受自然的节律，过着更为恬淡的生活。非洲这块土地同样并非“黑暗的中心”，并非是野蛮的、激

1 本文有关《瓦解》的引文均来自 钦努阿·阿契贝，《瓦解》，高宗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情的和非理性的，这里的生活安宁祥和、自足和自洽，有各种传统节日、庆典、风俗、宗教和律法，这些都是这里的活力、智慧和凝聚力的结晶。

作为由传统伦理秩序支配的共同体，《瓦解》中的乌姆奥菲亚秩序井然，有着能够有效运转的内部构造。首先，明晰而稳固的社会结构是这一伦理共同体的基石。同帝国的类似记载相反，乌姆奥菲亚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堪，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共同维系着这里的社会秩序。在白人到来前，这一乡村共同体遵循的是传统的伦理秩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长幼尊卑有序，男女分工明确，这里的自治结构始终在有效运转，地母、长老、祖先的灵魂和个人的“气”等共同指导着各位成员的日常行为，各项行政、奖惩和等级制度清晰明了，这里的社会秩序井然、有机和和谐。这里还有像木薯节这样的节日，每家每户都会备下丰盛的食物，呼朋唤友，大家一起庆祝节日，纵情狂欢。当有重大事件需要做出决定，不管是内部纠纷，还是同其他氏族间的矛盾，都会在氏族集会中商议，氏族长老们德高望重，并不会独断专行，只手遮天。当然，不同氏族间会发生战事，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正义的”战争，需师出有名，在和平方式无法有效解决争端时，才会诉诸于武力。其次，温情、欢乐和众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是连接这一伦理共同体的纽带。男人们负责在田间地头耕作，而女人们则负责照顾孩子、家务事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繁忙的一天结束后，家人则会围坐在一起讲故事，其乐融融，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孩子们获得各种教益，传统伦理观念由此得以传承。借钱给别人，一旦对方无力偿还，也不会逼债。当族人家中有红白喜事，像奥比埃里卡女儿结婚，以及埃塞乌杜的葬礼，左邻右舍都会全家出动，全心全意地前去帮忙。正是在埃塞乌杜的葬礼上，奥贡喀沃的枪不小心走火，让埃塞乌杜十六岁的儿子当场殒命。这里的人们殷勤好客，当奥贡喀沃被迫流亡，前往投靠舅舅乌成杜时，他母亲这边的亲人热情地接待他。为了他能够安居乐业，不仅帮他建好房子，还赠与木薯种子。在流亡期间，好友奥比埃里卡帮助他管理土地，将收成换成玛瑙贝，每年按时给他送过去。最后，对美德的追求是这一伦理共同体活力的源泉。在乌姆奥菲亚，大家珍视美德、荣誉和头衔，这里品评人的首要标准是他“双手的业绩”，能否获得头衔，能否在氏族中获得尊重，依靠的是德行和成就。奥贡喀沃的父亲乌诺卡是个不热衷于名利的懒汉，一生散淡，去世时一事无成，不仅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遗产，还债台高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坚强、决心和责任感，奥贡喀沃成功地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他的名声是靠他自己的真本事得来的”（Achebe, *Home and Exile* 3）。初时，奥贡喀沃家徒四壁，他曾到恩瓦基比家中去借木薯种子，后者家境殷实，但恩瓦基比因为奥贡喀沃的优秀品质而信任他，慷慨地借给他八百个木薯，这比他希望借到的数量要多出一倍。天道酬勤，日子逐渐风生水起，奥贡喀沃不仅成功娶到三位妻子，还获得多个重要头衔。

如同一架庞大的机器，帝国是由军队、世俗权力、宗教、法庭和贸易等

组成的综合体。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传统的伦理秩序遭到蔑视、破坏和肆意践踏，终至土崩瓦解，一套全新的伦理秩序开始取而代之。犯禁的人、贱民们和像恩莱卡这样生了双胞胎的母亲之前都被大家瞧不起，是氏族之中的“边缘人”，但在新的伦理秩序中，他（她）们却得到接纳，新的伦理规范亦由此得以宣扬。在建构、维持和推行这套全新伦理秩序的各种因素中，宗教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为高效地操控乌姆奥菲亚，帝国并未直接采取军事占领的方法，而是先借助宗教。传教士们在乌姆奥菲亚安营扎寨后，通过愉快活泼的歌声、简洁明了的故事和春风化雨般的温情，慢慢地吸引这一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最初将教堂建在“凶森林”，这一在原住民的想象中属于鬼魅和黑暗的地点，显然是边缘中的边缘；但凭借其悲悯的情怀和开放的态度，宗教逐渐赢来了信众。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共同体的维系都离不开共同体对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对外部的排除是维持共同体自身凝聚力的手段。一旦外部被新的力量收编，边界被抹除，内部失去外部，其向心力必将大打折扣。当边缘群体不断“逃逸”，走向另一“中心”，旧有的信仰和伦理规范在氏族的影响力就会受到侵蚀，导致原有共同体的合法化危机。外来宗教将导致这一共同体重构或走向瓦解，正如伊祖鲁所言，新的宗教如同“麻风病人”，零敲碎打地侵蚀共同体。宗教在共同体的内部运作，方式隐蔽，“白人是很狡猾的。他带着他的宗教，不声不响地、和颜悦色地来到。我们只是觉得他愚昧无知得可笑，让他留下了。现在他争取到了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氏族就不能再像一个人似地行动了。他在那些使我们团结一致的东西上割了一刀，我们已经瓦解了”（158）。当奥贡喀沃的儿子恩沃依埃投入新宗教的怀抱时，共同体内部的裂痕就已深如沟壑，无法弥合。宗教的作用并不止于教化，同时还在为殖民统治机构培训工作人员，不难想象，在传教士学校学习的恩沃依埃最终将成为帝国机器上的零部件，这也是阿契贝父亲的人生写照。在宗教之后，白人开始设立商业中心、政府和学校，全方位地管控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金钱和利益逐渐取代“公序良俗”，处理人们之间纠纷的不再是长老，而是白人的法庭。帝国就像一位两面神，一切顺畅时，表现出的是菩萨低眉般的温和；一旦遭遇抵抗，马上就会金刚怒目，表现出强硬的一面。意识形态和暴力互为表里，共同驱动帝国这架马车，《瓦解》生动地演绎了这一机制。

为构筑、维持和巩固这套全新的伦理秩序，帝国会调用各种资源。如前所述，一旦其纤细柔软的触角遭遇抵抗，帝国马上会展示出暴戾的一面。在柔弱而温情的表象背后，是强大的武力支撑，正如阿契贝所言，“白人不仅带来了一种宗教，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政府”（140）。在《瓦解》中，当一位白人在阿巴姆被杀害，作为报复，在集会时，阿巴姆整个氏族惨遭屠戮。在摧毁白人教堂后，奥贡喀沃等参与者遭到行政长官的羞辱、拘禁和惩罚。而当奥贡喀沃杀死法庭差役时，面对帝国摧枯拉朽般的强力，族人们开始噤若寒蝉，纷纷选择沉默、退缩或屈服，不再追随奥贡喀沃。昔日荣光的失落和

族人们当下的表现让奥贡喀沃痛彻心扉，最后悲愤地自杀。宗教的内部同样存在仁慈和严厉两个面向，如果说布朗牧师代表的是“柔情”的一面的话，詹姆士·斯密士牧师则代表强硬的一面。前者的柔弱、妥协和对和解策略的坚持，并非表明他是帝国的“异数”，旁逸斜出，而不过是帝国的另一张面孔而已。无论是“温和”，还是粗暴的方式，终极目标并无二致，都是为了对殖民地的征服，将这里的人民收于麾下，让他们为帝国奔走。在代表精神操控的宗教和以暴力为特征的世俗权力的双重作用下，乌姆奥菲亚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等各个层面都开始陷入危机，奥贡喀沃珍视的价值被无情践踏，他的死亡则表明他高度认同的共同体将无可避免地灰飞烟灭。关于反抗事件的文字记录将被命名为《下尼日尔地区原始氏族的平定》（*The Pacification of the Primitive Tribes of the Lower Niger*），淹没在帝国的档案中，成为帝国征程中无足轻重的插曲。

三、族群伦理视域下的民族性批判

乡愁同样可以被用于对故土进行深刻地批判¹，《瓦解》中被乡愁笼罩的故土令人魂牵梦绕，但阿契贝并未一味地在追忆中沉溺，并未单纯地美化本土文化，舌敝唇焦地为其添媚增姿，在将共同体的瓦解归咎于帝国入侵的同时，他同样痛心疾首地对非洲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对非洲的腐败、任性、愚昧、社会不公、领导的平庸和种种伦理失范，阿契贝的批评可谓是不留情面，在评价尼日利亚时，他曾言辞俱厉地说道，“它（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为混乱的民族之一。是太阳底下最腐败、最迟钝和最没有效率的地方之一（……）这里肮脏、麻木不仁、嘈杂、招摇、不诚实和粗野。总而言之，它是地球上最令人不悦的地方之一”（Achebe, *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11）。国人的“劣根性”同样令他悲愤不已，他甚至曾不无悲愤地控诉道，“我觉得原谅尼日尼亚和我的同胞们并不容易”（阿契贝，《非洲的污名》52）。不难看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瓦解》伦理诉求的又一指向。

作为悲剧英雄，奥贡喀沃的悲惨命运是非洲命运的缩影，他性格上的缺点映射的则是非洲民族性中的不足。奥贡喀沃精力充沛，具有进攻性，为走出父亲的阴影，不像父亲一样沦为氏族中的失败者，他从小就努力成为强者。不管在摔跤场上，还是在种植园中，抑或是在对待妻子的方式上，奥贡喀沃坚持以强者的形象示人。对长者和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他敬重有加，但在不如自己的人面前则总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甚至连话都不屑于同他们讲。坚强和勇敢是族人们肯定、珍视和敬重的品质，但奥贡喀沃的缺点在于不懂得灵活变通。关于非洲民族性中的这一缺陷，在回答索因卡的提问时，阿契贝说道，“在我看来，这一特定社会的弱点在于缺乏适应性，不懂

1 参见 Dennis Walder. *Postcolonial Nostalgias: Writing, Representation, and Mem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2.

得融通 (bend) (……) 在他那个时代, 强人就是那些永不低头的人, 我想这是这一文化自身中的一个错误” (Lindfors 11)。就此而言, 奥贡喀沃是一个极端化的范例。当妻子没有及时回来做晚餐, 不顾“和平周”的禁忌, 他不问青红皂白地将她毒打了一顿。另一位妻子从香蕉树上摘了几片叶子包食物, 他同样大打出手, 当这位可怜人稍微发发怨气, 他竟然气急败坏地拿起猎枪, 朝她开了一枪。就杀死养子这件事而言, 奥贡喀沃本可以置身事外, 但为维护自己的强人形象, 不让别人觉得自己软弱, 他手起刀落, 亲手砍死了伊克美弗纳。显然, 他的好朋友奥比埃里卡更具灵活性, 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懂得变通。对于神或是长老们的决议, 奥比埃里卡经常持保留意见, 而不是毫无保留地赞同, 和奥贡喀沃形成鲜明对照。对于奥贡喀沃参与杀死伊克美弗纳这件事, 他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此外, 奥贡喀沃还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易怒、顽固, 拒绝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在阿契贝眼里, 这些都是非洲民族性中的缺陷。

乌姆奥菲亚并没有被一味地浪漫化, 在传统伦理秩序的背后, 同样还隐藏着迷信、愚昧和残忍。不同部落间不时会发生械斗, 在野蛮的打斗中, 不少人命丧黄泉, 死者的头颅还会被砍下来用于炫耀。奥贡喀沃在此类械斗中就杀死过五个人, 他为此骄傲不已, 他喝棕榈酒的酒杯就是用他杀死的第一个人的人头做成的。在这里, 女性地位低下, 对女性的欺辱、压迫和随意打骂到处都司空见惯。女性被视为男人的私人财产, 可以买卖, 妻子的数量和这个男人的社会地位成正比, 是男人身份尊荣的标志。这里还有形形色色的迷信, 自杀的人只能被埋在恶森林, 像奥贡喀沃父亲那样病死的人也得被埋在恶森林。双胞胎出生后都必须被遗弃, 这些恶习无疑体现了共同体中愚昧、残忍和血腥的一面, 正如白人传教士所言, 这里的宗教“要你们杀死自己的同胞和无罪的孩子” (130)。最令阿契贝悲愤的要数人民的愚昧, 当奥贡喀沃自杀而死时, 大家不仅没有把他敬为英雄顶礼膜拜, 反而认为他忤逆了地母, 甚至没有人愿意去将他的尸体从树上取下来, 这一事件和鲁迅提到的吃人血馒头的行为可谓是异曲同工。关于国人的愚昧, 阿契贝曾说道, “我担忧的并不是当局——我从来不为当局担忧, 也不是那些官方的愚蠢行为, 甚至不是那四个被乱刀砍死的人。而是那几千个对这自身的污染和谋杀如此露骨大笑的人们” (阿契贝, 《蚁原荒丘》48)。阿契贝眼中的民众和鲁迅笔下的看客们同样地麻木不仁, 在《再也不得安宁》中, 他曾借故事中人物奥比之口强调说, “老百姓吗? 教育他们? 没可能” (阿契贝, 《再也不得安宁》47), 阿契贝心中的绝望溢于言表。

西式教育让阿契贝对现代伦理秩序有了深入了解, 对照之下, 阿契贝自然能更清晰地认识到非洲传统伦理秩序中的种种失范。阿契贝的反思精神绝非心血来潮, 故作姿态, 而是一以贯之的。在《神箭》 (*Arrow of God*) 中, 当提及为白人工作的族人时, 阿契贝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都成功地把自

己变成了自己人的小暴君。这似乎是黑人的性格特质”（阿契贝，《神箭》134）。作品中的人物伊祖鲁则总结说，“他跟那位白人的争吵，跟他与他的族人们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起来，一点意义都没有”（阿契贝，《神箭》198）。最后，由于心中充满对自己族人的怨恨，伊祖鲁甚至拒绝宣告木薯节的到来，族人们因此无法收获已成熟的木薯，劳动成果只能付之东流。阿契贝强调文化的适应性，面对挑战，能够适应的文化才具有生命力，“如果我们做好接受挑战的准备，在不损害我们关于人的尊严的一些根本性看法的前提下，做出一些必要妥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Lindfors 67）。面对帝国的入侵，奥贡喀沃拒不妥协，这一立场并不符合阿契贝的期待。显然，阿契贝更赞赏《神箭》中的伊祖鲁，伊祖鲁虽然固执，但又不失灵活。在朋友和家人都还云里雾里的时候，他就敏锐地意识到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必将导致伦理秩序的重构，并主动将儿子奥都克送到白人教会中“充当自己的耳目”，因为“一个人跳舞必须跳那种当下流行的舞”（阿契贝，《神箭》233）。在变革的大潮中，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行不通的，这也是为何故事只能以奥贡喀沃的死亡结束。在外部力量的进逼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类似于乌姆奥菲亚这样的共同体，都无法把控自身的命运，都不过是在汹涌的历史大潮中跌宕起伏的一叶孤舟，渺小且微不足道，一切努力注定只能是螳臂当车。阿契贝对民族性的深刻反思曾招致非议，欧格德（Ode Ogede）就认为，阿契贝对非洲人的描写和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的描写如出一辙（23）。辛辣地批判民族性中的不足，是因为阿契贝和鲁迅一样认为，非洲的未来需要“新人”，就是像恩沃依埃和奥都克这样的接受了白人教育的非洲人，在非洲未来的建设中，这些“新人”将担负起重任。

不难看出，由于其两种伦理身份间的内在冲突，阿契贝在族群伦理关系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在《瓦解》的字里行间，不少地方似乎都在暗示，虽摧毁了非洲的传统社会，但帝国同样为昔日的“荒野太漠”开启了文明之门，带领这里的人们抛却陈规陋习，革故鼎新，将非洲带入现代文明的烛照之中。对旧世界的省思并没有转化为无条件地拥抱新世界的激情，由于阿契贝对民族“劣根性”的认识，使得在评价传统社会“瓦解”这一历史进程时，他只能闪烁其词，不置可否。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殖民和后殖民体制的到来侵蚀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模式。对于哪一个更好之类的问题，传统的还是新的，非洲的还是欧洲的，我并不关注；两者都有多种可能性、无法预计的地方和模糊性”（Lindfors 89）。关于独立后的非洲的命运，阿契贝同样忧心忡忡，当然，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他十分清楚，“相对于英国曾经的所作所为而言，今天的伊格博人对他们自己文化的破坏毫不逊色，或者说更为严重”（Lindfors 66）。因此，不管是对新殖民主义，还是对民族主义的路径，阿契贝都始终保持着警醒。与此同时，由于其认识上的困境，阿契贝只能在“暴力和武装抵抗的话题上沉默”（Ogede 21），而不会像法

依那样宣扬依靠暴力去获取独立和解放。采取暴力手段的奥贡喀沃注定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人物，但事实上，如果综观非洲的独立和解放史，就会发现暴力反抗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为看不到前途，在思考非洲未来的命运、另一种历史可能性和族群伦理关系时，同其他众多作家一样，阿契贝陷入了“无解的”迷局。

总之，《瓦解》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作品中洋溢的乡愁气息，更得益于阿契贝在思考历史、文化和族群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伦理关怀。“美好的”往昔给人带来的沉浸式愉悦，以及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给读者带来的巨大痛感，使得作品中的故事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但在对以奥贡喀沃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立场进行否定后，由于自身的局限，阿契贝陷入了宿命论的泥沼，无法找到一条殖民统治之外的路径，同样无法为全球化浪潮下的族群伦理关系重构开出济世良方。《瓦解》是史诗，是非洲历史长河中跃起的绚丽浪花；是乡愁，是面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伦理秩序消逝时的挽歌；但它同样是迷局，是落入西方现代性修辞陷阱后的无奈叹息。

Works Cited

Achebe, Chinua. *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Enugu: Fourth Dimension Publishing Co., Ltd., 1983.

— *Home and Exile*. Oxford: Oxford UP, 2000.

钦努阿·阿契贝：《瓦解》，高宗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

[Achebe, Chinua. *Things Fall Apart*. Trans. Gao Zongyu.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9.]

——：《蚁原荒丘》，朱世达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

[—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Trans. Zhu Shida.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9.]

——：《神箭》，陈笑黎、洪萃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 *Arrow of God*. Trans. Chen Xiaoli and Hong Cuihui.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1.]

——：《非洲的污名》，张春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

[—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Trans. Zhang Chunmei. Haikou: Nanhai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再也不得安宁》，马群英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

[— *No Longer at Ease*. Trans. Ma Qunying. Haikou: Nanhai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Boym, Svetlana.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Emenyonu, Ernest N. *The Rise of the Igbo Novel*. Ibadan: Oxford UP, 1978.

Falola, Toyin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8.

Fritzsche, Peter. “Specters of History: On Nostalgia, Exile, and Moderni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 (2001): 1587-1618.

- Gikandi, Simon. *Reading Chinua Achebe: Language & Ideology in Fiction*. London: James Currey, 1991.
- Innes, C. L. *Chinua Acheb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 Killam, G. D. *The Writings of Chinua Achebe*. London: Heinemann, 1977.
- Lindfors, Bernth, ed. *Conversations with Chinua Achebe*.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7.
-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Moore-Gilbert, Bart, et al, ed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Trans. Yang Naiqiao, et al. Beijing: Beijing UP, 2001.]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Ogede, Ode. *Acheb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01.
- Su, John J. *Ethics and Nostalgia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 Wren, Robert M. *Achebe's Worl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ovels of Chinua Achebe*. Washington D. C: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80.